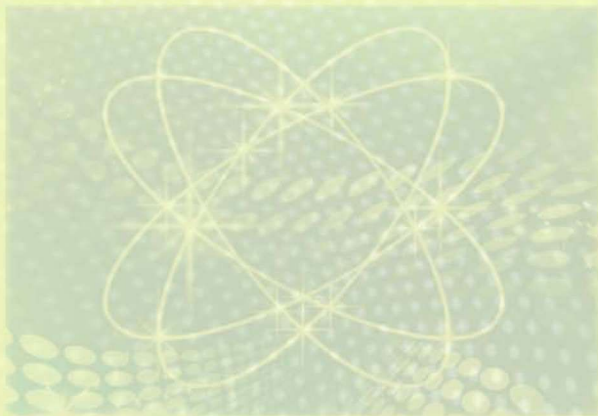


晚清江浙礼学研究

李江辉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晚清江浙礼学研究

李江辉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清江浙礼学研究 / 李江辉著 . —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 2011

ISBN 978 - 7 - 224 - 09643 - 9

I . ①晚… II . ①李… III . ①礼仪—研究—江苏省—清后期②礼仪—研究—浙江省—清后期 IV . ①K892. 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1710 号

晚清江浙礼学研究

作 者 李江辉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12 印张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9643 - 9

定 价 20.00 元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西部人文学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

主 任：张岂之

委 员：谢阳举 赵馥洁

刘学智 方光华

张茂泽 肖永明

范立舟

内容简介

礼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儒学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经学的核心内容。它虽属于经学，却又能发挥超出经学学术以外的现实教化作用，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民俗等密切相关。

江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对晚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晚清江浙地区的礼学研究能够反映和代表晚清礼学研究的特点和成就，从学术和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全面地展现了晚清社会、学术思想的真实面貌和二者之间的互动。因此，研究晚清江浙礼学具有极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乾嘉汉学的兴盛以吴派和皖派为代表，吴派以苏州地区为中心，而皖派以皖南为中心，而且汉学的纯粹考证风格自形成以来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道、咸、同以来，社会动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首当其冲，江浙地区成为国内外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区域。对这一时期乾嘉汉学陷于章句训诂和烦琐考证弊端的反思，是学术与现实的集中反映，最终引起了嘉、道之际的学风转变，直接导致清代的学术中心从皖南、苏州地区转移到扬州、浙东、常州地区。

正是在种种困境之中，这些地区产生了一批晚清最重要的礼学家。朱彬、邵懿辰、黄以周、孙诒让为学专究于礼，阮元、凌曙、刘师培、章太炎等亦长于礼学。他们在礼学研究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解决了历史上关于《三礼》文献的形成、传承过程存在的许多争议，梳理出《仪礼》、《礼记》、《周礼》的授受源流，为礼学史、经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而晚清江浙礼学家对古代礼制全面的总结，解除了自西汉以来对明堂、封禅、巡狩之礼便莫

知其原的困境，对各项制度、各种说法的优劣得失进行了客观、细致的分析评判；通过探讨礼与理的关系，疏通汉、宋学术，挖掘名物制度之中蕴涵的道德伦理意义，为清代学术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晚清江浙礼学家取得这一系列成就，得益于对乾嘉以来的日趋成熟、完善的考据学方法和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并且通过释例、绘图、经传子史互证，进一步强化了晚清礼学研究方法、成果的科学性。

晚清江浙礼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导致以礼学为核心的经学在晚清时期臻于极盛，此后骤衰，濒临崩溃之境，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学术体系也处在解体的边缘。

晚清礼学研究以扬州、浙东、常州为中心，各有特色，既继承了前辈学者的学术风格，又能充分体现晚清社会带给学术研究的时代烙印，即以学术经世致用，以学术挽救人心。他们的礼学思想和礼制研究是对清代乃至整个礼学史的系统总结，为近代中国学术发展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清江浙三大学派礼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继承性、复杂性和时代性，反映出晚清学术的真实面貌，也预示了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总 序

我们在古都西安筹划“人文学术研究”丛书事宜，正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和启动之际，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促进了“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组稿、改稿、定稿等一系列工作。这里所说的“鼓励”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着具体实在的思想内容。在我们的理解中，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建设无疑应当是中心课题，而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教育、文化、科学的开拓和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应占有重要地位。在文化和科学中，研究“人”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的思想、人的感情等等被称为“人文科学”，即通常所说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等的人文学科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和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经济建设都有内在的紧密联系。道理显而易见：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人”创造的，因而对于“人”自身的研究，并使人在精神世界方面感到充实，具有高尚的理想和情趣，并遵奉道德规范等人文科学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我国西部有不少优秀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就西北地区而言，他们大多集中在西安、兰州，而在敦煌、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地也有人文学者群。西部地区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基本是在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或文化、文物行政机构工作。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敦煌学、历史地理学、中国思想史、周秦汉唐历史学、中国考古学、民族史、语言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有些已经出版，有些正准备出版。在这样的机缘中，我和一些年轻的人文学者决定组织编辑、出版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拟分若干辑先后出版。其中既有与西部开发有关的研究内容，也有没有直接关

系而属于人文科学普遍问题的研究。总之，出版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是为了繁荣我国人文学术研究而贡献一点力量。

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出版，得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岂之

2000年2月13日于

西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目 录

导 论	(1)
一 礼学与晚清学术	(1)
二 晚清江浙礼学的代表性	(3)
三 研究现状	(5)
四 方法与问题	(7)
第一章 晚清学风的转变与江浙区域学派的形成	(10)
第一节 对汉学的反思	(11)
第二节 晚清学风的转变	(14)
第三节 晚清江浙学术中心的转移	(18)
第二章 晚清江浙学派与礼学	(23)
第一节 晚清江浙学派之划分	(23)
第二节 扬州学派	(28)
第三节 浙东学派	(38)
第四节 常州学派	(44)
第三章 扬州学派的礼学研究	(50)
第一节 朱彬与《礼记训纂》	(50)
第二节 阮元的礼学研究	(53)
第三节 刘师培的礼学研究	(71)
小 结	(89)
第四章 浙东学派对名物制度的总结	(93)
第一节 黄式三、黄以周的礼学思想与礼制研究	(94)
第二节 孙诒让的《周礼》研究	(105)

第三节 章太炎的礼学研究	(118)
小 结	(127)
第五章 今文学派礼学研究的新思路	(129)
第一节 刘逢禄的礼学研究	(130)
第二节 凌曙、陈立、陈奂的礼学研究新思路	(135)
第三节 邵懿辰与《礼经通论》	(141)
小 结	(151)
第六章 晚清江浙礼学的地位	(154)
第一节 礼学问题的突破	(154)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成熟	(158)
第三节 晚清江浙礼学研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	(161)
结 论	(165)
参考文献	(171)
后 记	(179)

导 论

一、礼学与晚清学术

“礼”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儒学理论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重要环节。《孝经》：“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礼器》：“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因此，礼具有协调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功能，是它们之间组织、沟通的最佳桥梁。商周以来，“礼”一直就是古代社会、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构成元素，《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民之所以生也。”礼成为处理人生日用、国计民生的基本准则，逐渐形成各项礼制、礼俗。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对“礼”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掀起了一个礼学发展的高潮。

汉代，《仪礼》、《礼记》、《周礼》的传承，标志着先秦以来对“礼”的研讨进入了一个总结、整理的阶段。“礼”的文本形式和实践方式在这一时期进行了重大调整，礼学作为经学的核心内容，其地位正式确立。汉初拨乱反正，叔孙通制定礼仪，以正君臣之位。汉文帝时，贾谊分析社会政治、文化风俗的弊病，指出急需重定礼乐制度，但是因为大臣拦阻未果。汉武帝即位之初，奖励儒学，曾议立明堂，制礼服。他独尊儒术、封禅泰山等一系列活动，对汉代礼乐制度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武帝以后，“礼”之形态、地位的确立屡经波折，其中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礼学本身为适应汉代以来的社会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原因。与先秦时期相比，两汉时期礼的种类、形式变得更为复杂，其功能也更加细致。汉代经学家在社会制度和

文献两方面对古代各项礼仪所做的整理和修订，基本奠定了后世两千年“三礼”经学体系的框架。

两汉学术以经学为主，经学家们对经典的诠释采用章句注疏的形式，因此他们对礼学的研究也是以这一形式为主，汉代礼学的成就体现在经学家通过经典诠释所形成的章句注疏之中。唐代之后，虽然还有人研究礼学，并有一些代表性的著述，如《五经正义》等，但总体来说研究还显得不够深入。

汉代经学在清代受到特别重视。清代学术因批判理学空疏而兴，提倡实证，以为汉儒最得孔学真传，于是致力于考证、发挥汉儒经说，搜集整理汉代经师的章句训诂，辨别诸家学说异同，于是清代学术又有“汉学”之名。清以前的历代学者大都是根据六经文献，将《仪礼》、《礼记》、《周礼》的形成及各项礼乐制度的起源、确立归功于孔子、周公或三代前之圣人。而清代学者们则运用文字训诂、史料考据、金石校勘等考据学手段，阐明两汉上至三代的礼学思想、制度，梳理礼学诸家之说，逐渐弄清“三礼”文献的材料来源和经典的形成及传授过程，对促进儒学的发展功绩卓著。其中又以晚清学者的成就最大，除了继承乾嘉考据学的优良传统，他们中有些人同时借鉴西方的社会学等研究方法，能够以新的角度审视儒家经典。

《清稗类钞》对清代礼学研究按照《仪礼》、《礼记》、《周礼》及《通论》四类作了简要的概括：

三《礼》之学，张尔岐于《仪礼》首正郑注句读，廓清之功，比于武事。专考讹脱者，则有卢文弨、金曰追诸人。专习汉读者，则有段玉裁、胡承珙诸人。分类专考者，则有任启运、程瑶田诸人。若胡培翬者，博闻笃志，阅数十年，上推周公、孔子垂教之旨，发明郑康成、贾疏之得失，旁逮鸿儒经生之议，成《正义》四十卷，唐宋以来，罕有其匹。《周礼》则戴震考工，熟精名物；段玉裁汉读，博通训诂；阮元校勘，广列异同。似此诸家，咸宜甄录。《礼记》则通校全书，不遗细微者，元与张敦仁是也。疏证明通，笃守师法者，李富孙、陈乔枏是也。若夫衣服宫室之度，冠昏丧祭之仪，军赋官禄之制，天文地理之说，能考求古义，集礼家之大成者，则莫如秦蕙田之《五礼通考》。而综贯群经，博采众论，

实事求是，惟善是从，不墨守一家之学者，江永之《礼书纲目》，黄以周之《礼书通故》，亦其选也。^①

据《四库全书总目》、《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清经解》及其《续编》等书，清人研究《周礼》的著作多达200种左右。清人著述，或全面笺注《周礼》，或考释其中某一制度，或就单篇为解，或校勘经注，或为集大成之作。其中研究《仪礼》的著作多达220多种。在经文的考释、名物制度的考证、礼例的分类归纳研究、版本的校勘等方面，均超过前代。此外，清人研究《礼记》的著作多达260多种。例如，单是《清经解》、《续清经解》中收录的“礼类”著作就约有92种。《清经解》中收录《三礼》总义8种，《周礼》10种，《仪礼》8种，《礼记》9种。《清经解续编》中收录《三礼总义》8种，《周礼》12种，《仪礼》23种，《礼记》11种，其他也可算作礼学著作的有3种。从清代学者的这些丰硕成果就可以得出，对传统儒学发展最后总结阶段的晚清礼学加以系统研究，对当代儒学发展和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总之，清代礼学成果丰硕，特别是晚清《礼记训纂》、《礼书通故》、《周礼正义》以及《仪礼正义》更是礼学史上的集大成著作，而现当代对这些遗产进行系统研究却是极少，还停留在文献整理阶段。

二、晚清江浙礼学的代表性

江浙地区历来有“东南小邹鲁”之称，而清代这一地区更是学者云集，书院众多，图书收藏、出版业鼎盛。“明清之交，江浙学者以藏书相夸尚。其在江南，则常熟毛氏之汲古阁为称首，且精择校刻以公于世。继之者常熟钱氏之绛云楼、述古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昭文瞿氏之铁琴铜剑楼，以至太仓顾氏、泰兴季氏等，咸蓄善本，事雠校，自此校书刻书之风盛于江左。”^②清初诸大儒如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陈确等都是江浙人氏，他们学术活动的范围也是集中在江浙地区，为江浙学术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

① 徐珂编《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第3839页。

②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63页。

才，树立了良好的学风。惠栋、戴震、焦循、阮元等江浙诸儒继承清初诸大师遗风，形成了以追求实证、考据为特征的学术风气，影响遍及全国。所谓乾嘉汉学、考据学之名实是因江浙学者而起。从图书的出版、收藏来看，《四库全书》修成，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江浙地区受惠最大。“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告成。特命如内廷四阁所藏缮写全册，建三阁于江浙两省，谕士子愿读中秘书者就阁传写，所以嘉惠艺林。……六十年工竣，学政（臣）阮元本奉命直文渊阁事，又籍隶扬州，扬州大观堂所建阁曰文汇，在镇江金山者曰文宗。……复奉命视学两浙，得仰瞻文澜阁于杭州之西湖。”^①《全书》被缮写七部，其中三部便藏于江浙，应当说《四库全书》的修成对清代江浙地区的学术发展影响最大。因此，这一区域无愧于梁启超所说“人文渊薮”之称。在清代，经学研究曾经形成吴派、皖派、常州学派、浙东学派、扬州学派等不同学派，生动地反映出清代学术的发展历程和江浙地区学风的浓厚。

晚清时期，儒家经学体系面临崩溃和转型，礼学体系和内容也逐渐分化，传统学术进入了总结整理阶段，黄以周、孙诒让对古代礼制的研究是最具代表性的。同时由于西学传入，首先影响了江浙沿海地区，因此如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等，吸收借鉴近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分类方法，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利用诸多不同的审视角度和研究方法对礼学予以全新的研究，试图突破传统经学研究模式。道、咸、同以来，晚清社会复杂动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一带首当其冲，江浙地区成为国内外各种矛盾冲突的焦点区域。正是在这种困境之中，这一地区产生一批晚清最重要的礼学家，朱彬、邵懿辰、黄以周、孙诒让为学专究于礼，阮元、凌曙、刘师培、章太炎等亦长于礼学，而且他们的礼学研究各具特色，既继承了前辈学者的学术风格，又能充分体现晚清社会带给学术研究的时代烙印，即以学术经世致用，以学术挽救人心，尝试重新塑造适合近代中国的文化体系。因此，研究这一时段该地

^① 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擘经室二集》卷八，《浙江刻四库书提要恭跋》，中华书局，1993年，第565页。

区的学术发展变化,可以更清楚地揭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因此研究晚清江浙礼学,将会极有益于对清代学术及礼学史的全面把握。

三、研究现状

民国以来,“三礼”研究在继承清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老一辈学者陆续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礼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如郭沫若的《周官质疑》、任铭善的《礼记目录后案》、黄侃的《礼学略说》、钱穆的《〈周官〉著作时代考》、徐复观的《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洪业的《〈仪礼〉引得序》和《〈礼记〉引得序》、蒙文通的《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杨向奎的《〈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制作时代》,主要是解决“三礼”的年代问题,也是对疑古辨伪影响下礼学研究中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批判、总结。这一阶段的《仪礼》研究是“三礼”研究中相对较薄弱的,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则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为礼学研究开辟一个新局面,其实刘师培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礼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礼记集解》、《礼记训纂》、《周礼正义》以及《仪礼正义》等清代礼学典籍陆续点校出版,为进一步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顾颉刚、杨向奎、金景芳、沈文倬、饶宗颐等学者也发表了一批优秀成果,如顾颉刚的《“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和《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沈文倬的《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等,结合社会历史发展考察其成书年代及所记礼乐制度的真实性,为以后的礼学研究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出版了一批有相当水平的著作,如断代性的研究成果有陈戍国相继出版的古代“礼制史”系列、常金仓的《周代礼俗研究》、刘丰的《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勾承益的《先秦礼学》、华友根的《西汉礼学新论》等,主要集中讨论在汉代以前的礼乐制度。通论性的成果有邹昌林的《中国礼文化》、王启发的《礼学思想体系探源》、杨志刚的《中国礼仪制度研究》等,注重探讨礼的思想、文化内涵。而彭林的《〈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通过对《周礼》的主体思想分析,认为《周礼》成书于汉初高祖至文帝之际,在《周礼》成书年代问题上自成

一家之言；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礼乐文化的产生，均属力作。杨天宇译注的“三礼”也是近年“三礼”注疏中的力作，其论文集《经学探研录》所收大多也是关于礼学。另外，杨志刚的《中国礼学史发凡》、詹子庆的《对礼学的历史考察》都初步探讨了礼学史问题。在名物制度方面，如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属于对礼制问题做专题式研究，不乏创见。通解“三礼”的以钱玄《三礼名物通释》为代表作，该书分衣服篇、饮食篇、宫室篇、车马篇，分类考释礼制及名物，使纷繁的名物制度一目了然。他的《三礼辞典》收录《仪礼》、《周礼》、《礼记》《大戴礼记》四书中有关典章、制度、礼制、名物等所有专用词语约五千条，释义准确，引征广博，并用近世发现考古文物，印证文献记载。而王锸的《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对现当代“三礼”研究成果提要钩玄，有助于全面把握礼学研究的进展，也是难得的工具书。

1949年以来，大批简帛文献和考古遗址的发掘整理也极大地丰富了古代礼学研究。而1959年甘肃武威汉代《仪礼》木、竹简的出土，为研究《仪礼》在汉代的流传及经文的错讹，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陈梦家的《武威汉简》、沈文倬的《〈汉简〉服传考》及《〈礼〉汉简异文释》等文章，对武威出土的三种当属《仪礼》之类的汉简逐一考释，判其今、古。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丁凌华的《中国丧服制度史》、丁鼎的《〈仪礼·丧服〉考论》则分别结合考古资料、社会史、文献考证促进了“丧礼”研究。而随着郭店楚简的出土，《礼记》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古代学术研究的最大热点，成果更是不胜枚举。

20世纪末以来有三部研究清代礼学著作值得一提，其中林存阳《清初三礼学》专就清初礼学的发展，从社会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台湾学者张寿安的两部著作《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演变》、《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揭示清中叶情欲的觉醒与清代礼学研究的兴盛，梳理思想与考证的内在关联，掀起一股研究清代礼学思想的潮流。此外，一批清代和近代学者如戴震、阮元、孙星衍、钱大昕、孙诒让、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的全集、文集、遗书的陆续点校出版，为清代学术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上近几年也出版了一批关于清代学术的优秀

著作，如汤志钧的《近代经学与政治》、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彭林编《清代经学与文化》等，正在推动清代礼学研究向前发展。

目前对清代江浙地区思想学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扬州学派、常州学派、浙东学派研究上，从整体来看通常是围绕某一人物展开，对学派和区域缺乏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张舜徽的《清代扬州学记》、《清儒学记》等，扬州大学对扬州学派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优势。而较新的江浙学术研究成果如董平《浙江思想学术史》和郑晓江《江右思想家研究》，由于涉及范围太广，对晚清时期江浙学术的区域特点介绍尚不深入。海外相关研究的代表作当属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和《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着力讨论清代江南一带的学术发展路径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对晚清经学和学派研究具有很大启发意义。此外，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小岛毅等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于明清礼学研究也颇有见地。

综上所述，礼学研究成果虽然说已经比较丰富，但大都集中在“三礼”经典本身，或者大多单论一经，或以先秦两汉为主，关于清代礼学研究的寥寥可数，特别是从学术史的角度，通过系统研究清代礼学以见时代学术发展变化的就更为罕见，即便是已有的几部著作，也是关于清代前期和中期的。鉴于礼学在清代学术中所占的重要位置，目前的研究已经大大影响对清代学术成就的评价。

四、方法与问题

有学者认为对礼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以上古元典《周礼》、《礼记》和《仪礼》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二是以具体的礼仪为对象的研究，如对丧礼和婚礼的研究；三是关于礼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研究。”^① 现在的礼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偏重其中某一层面，而无法兼顾礼学在其

^① 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清史研究》，2006年第8期，第117页。